

明末清初就把生意做到了海外 说说义乌古代商贸业那些事儿

今天的义乌,满城皆市、万商云集,由此带来各种文化的大融合。这种融合,不仅加深了这座城市商业文明的底蕴,还推进了城市国际化的进程。

其实,据记载,早在明末清初,义乌人就已经做起了外贸生意,商业足迹触达中东地区。在漫漫历史长河中,义乌古代商贸业的发展耐人寻味。



江湾集市。



佛堂老街的“旧时光”。



老街商铺林立。



佛堂浮桥与古码头石碑。

水陆交通便利催生的商埠

探寻与古丝绸之路的渊源

古代常把市和井联系起来,称市为“市井”,市井交易是商业的滥觞。比如,《史记正义》中提到,“古者未有市,若朝聚市汲,共汲水,便将货物并边买卖,故曰市井。”《风俗通》中则认为,“俗言市井者,言至市鬻卖,当先于井上洗濯,合物鲜活,然后市,二十亩为井,今因井为市。”

在2000年绣湖广场旧城改造工程中,义乌发现了20多口古井遗址。如此密集的古水井,也从侧面表明义乌古代的商业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

翻阅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提供的众多文史资料,可以试着理一下义乌商贸业不同朝代的发展特色。比如,义乌在唐代出现经营盐业生意的盐商,宋时的义乌丝织、酿酒、陶瓷等行业较为发达,明清时期义乌商品生产有所扩大。

义乌与古代丝绸之路或许还有一些渊源。据南朝·宋·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“正月半,有神降陈氏之宅,云:‘我是蚕神,若能见祭,当令蚕桑百倍。’今人正月末作糕糜,为此也。”这是义乌本土著作中首次提到的蚕神。

受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,义乌对外开放程度和交流速度不亚于中原地区。一方面,西域的高僧受邀来义乌弘扬佛法;另一方面,义乌人傅大士的著作,也回传到丝绸之路上。

“大秦”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。据中国国史记载:“拂菻国:一名大秦,在西海之上,东南与波斯接,地方万余里,列城四百,邑居连属。”唐代诗人骆宾王在他的文集里,也提到了“大秦”这个丝绸之路终点的古地名,“西距大秦,杂金茎而孕气;南通交趾,枕桐柱以为邻……”种种迹象表明,唐时的义乌与古丝绸之路的关系密切,民间或有商贾往来大秦和义乌之间。

到了宋朝,经年不断的战乱致使陆上的丝绸之路几度中断。这时,随着造船业的日渐兴起,再加上罗盘相继使用,一些波斯人大多经海路来中国闽粤等地经商,有的还安家落户。在南宋,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更加繁盛。原产南洋的胡椒,在这时已成为义乌人的普通商品。被称为“乌伤四君子”的喻良能在其作品中提到:“水碓多至三十具,胡椒满贮八百斛。”

相对其他朝代而言,义乌明朝的商业史更加可圈可点,浓墨重彩。

无论是以前,还是现在,一个地方想发展商业,交通便利是基础。在没有火车和飞机的古代,交通基本就是靠陆路和水路。

据《义乌县志》记载,追溯到古代至20世纪初,义乌设有杭州到古代南昌驿道。从诸暨宣河街入境,经城区进入金华境内,城区东可至东阳,北至浦江。义乌水运运输汗青悠久,据嘉庆《义乌县志》记载,佛堂镇船埠“泊船如蚁”,曾是盐运必经之地,商旅长途往返,多赖州楫水运。顾名思义,义乌江流经义乌,也因此衍生了多个码头。

佛堂江面尤其开阔,这也为佛堂成为明清两个朝代以来的商埠创造了一定条件。据说,20世纪50年代以前,佛堂码头上的船只可达金华,再由金华可达衢州、严州、徽州、杭州、苏州、扬州,以至更远。据民国时期重修的《延陵吴氏宗谱》记载:当时“四里滩有货船十几只”,而江南村的“号船、货船、码头船就有卅六只”。渔船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。义乌的客运船叫“交通船”“快船”,义乌——佛堂仅靠江湾码头,稠城至江湾需运行2.5小时,至佛堂3.5小时。1960年10月,稠城

至佛堂公路通车,稠城至佛堂的两艘交通船才停航。

义乌商业在明代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工商业集市的崛起。据万历六年《金华府志》记载,金华府的义乌县有市13个;万历二十四年的《义乌县志》记载,当时的义乌有集市16个,包括被很多人熟知的湖塘市、青口市、江湾市、光明市、赤岸市、倍磊市、苏溪市、双林市、花溪市等。到了清朝嘉庆七年,义乌已有集市29个,与明万历时相比,几近翻了一番。

除了集市外,明代义乌还有十多处街

市。如被后人熟知的倍磊街商业模式就形成于明代,在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一度繁荣。大约在明代正德年间,绣湖有“湖亭渔市”一景。正德二年,明政府下令撤销义乌等县共三十八处税课局。

可别小看这些集市、街市,在当时它们构成了密集的网络,在商业上可以相互支持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这些集市充分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,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,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,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。



老街入口处。



义乌江畔一角。

商人经济地位的提高

次子专门做粮食生意,经营“南粮北运”,去北方销售粮食,赚了钱后,曾经在“背景顺天府大兴县第四厢富户地方,设田三百亩”。商人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。有文字记载,义乌隐士金守宪曾提到“弟喜驰猎,好行贾,隐士勿禁也”。

令人称颂的是,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明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除了在国内走向南北外,也有义乌商人开始把目光瞄准了国外,尝试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,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“外贸”。

“出塞贾迁,波斯珍异,载满归船”,根据赤岸的冯氏宗谱记载,明末清初,赤岸人冯允奇开始做外贸生意,足迹到达中东地区。据有关人士推测,冯允奇当时出国经商的路线大致是这样的:先从义乌坐船到金华,然后转达衢州上岸,从江山翻过仙霞岭,到达福建境内,再从漳州

月港出海。据悉,冯允奇是目前发现的义乌最早从事外贸的商人。

明末清初,由于战乱、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,义乌的商业活动也受到了影响。大概从康熙中叶起,社会生产从恢复期转入迅速发展的阶段,清代商业资本的活动领域也逐步开拓。顺治十八年,种蔗制糖的技术传入义乌。从此,以卖糖换钱的“敲糖”生意迅速崛起,至乾隆年间达到极盛,义乌全县约有“糖担”万副,“敲糖帮”以廿三里、苏溪两地最为集中。随着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,义乌逐步形成了成规模、有组织、系统化的“敲糖帮”和行担经济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古人在商贸领域的智慧和探索,为后世子孙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

随着义乌糖蔗种植人数和面积的增加,以义乌红糖制作的糖食品也流行起来。

据有关资料记载,民国初年,义乌民间糕点技师流入杭城,摆摊设店,渐成杭城糕点中的一支流派,主要以精制小食品居多,以吴义泰、傅香村等茶食糖果号产销的麻饼、寸金糖、麻片为代表,形成了“义乌帮”。

据《浙江经济纪略》(民国)记载,当时义乌的商道主要有三:一是至宁波旱道,从东乡过东阳;二是赴苏杭大江水路,从南乡过金华、兰溪等处;三是赴临、绍小江水路,由北乡过诸暨等处。而长期持续的商业流通,也孕育了义乌独有的商贸文化。

“金鸚鵡,银鸚鵡,飞来飞去飞义乌”。这句俗语道出了义乌人性格中勤劳勇敢的一面,以及为了生计敢于走南闯北的胆识和谋略。

(感谢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在史料方面提供的帮助。)

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/图

